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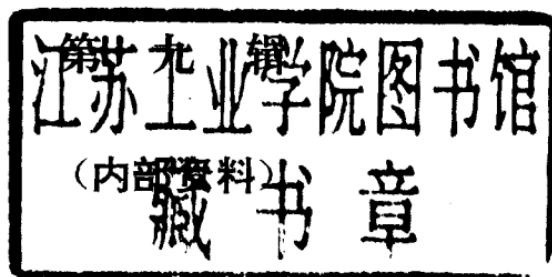
文史資料

◎9



政协许昌县委员会

许昌县文史资料



政协许昌县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政协许昌县学习宣传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任委员：包书亮

委员：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李季安 张格义 鲁守峰

政协许昌县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

主编 包书亮 李季安

副主编 石振林

**委员 赵金鉴 孔子静 徐开伟 周进勋
赵福祥 李天岭**

邮政编码：461000

联系电话：0374—5134811

目 录

●往事回顾●

- 许昌县的土地改革运动 杨建民(1)
忆小宋村农民协会 宋水盈(13)
忆我村的一次“急性土改” 孔繁泉(20)
在许昌县市报社三年间 赵金鉴(23)
回忆许昌县委干部训练班 赵 镜(35)
我在“三晋川润记”学商的一段经历 张鸿禧(38)
旧时许昌的理发业 崔坤卯(44)

●人物春秋●

- 我怀念的县委书记杜俊林 赵金鉴(47)
全国民兵模范贞子梅 包书亮(54)
蔡鹤年与许籍旅外同学会 李季安(58)
我所知道的王兆瑞 王仁贵(53)

●乡土·乡俗·乡情●

- 许昌民间婚丧寿诞旧俗 孔子静(62)
婚嫁旧俗中的帖式 方 志(83)
流行于许昌民间的禁忌 孔子静(88)
许昌民俗中的种种崇拜 孔子静(94)
我熟悉的儿歌与民谣 李季安(101)
忘不掉的儿戏 史 青(109)

●教坛艺苑●

- 许昌县的扫盲教育 孙长欣(141)
忆河南省第五区育幼院 贾全忠(146)

- 曲坛名园——聚乐轩书场 李季安(150)
许昌县的国乐小史 李 济(155)
曲艺名角张胡连 莲 舫(158)

老字号

- 享誉全城的马家油坊 ... 马西甫口述,李季安整理(159)
和合面粉公司始末 李醒亚(163)
1929年许昌城三大烟厂
..... 许昌市工会工运研究室提供(164)

战争岁月

- 忆蒋冯两军在半坡铺的战斗
..... 李西岭口述,余辉整理(165)
家乡的两次兵祸 孔繁泉(168)
李骏轻遗稿 赵金鉴提供(172)

村名·姓氏·人名

- 对许昌县姓氏的调查补正 许 志(175)
乡里人名拾趣 孔繁泉(179)

社会百态

- 许昌城的三个怪人 忽 平(183)
奇闻异事八则 李春如(187)
麻将场上的骗局 张来坤(192)

补 白

- 许昌县各民族分布情况 刁庆照提供(195)
许昌县昔日名胜古迹对联 滕 石提供(191)

许昌县的土地改革运动

杨建民

四十年代末，五十年代初，全县农民在中共许昌县委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。这个运动不仅进行得轰轰烈烈，波澜壮阔，而且还进行得扎扎实实，井然有序。包括土改复查在内，仅仅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，就把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，打了个粉碎，实现了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梦寐以求的“耕者有其田”。笔者有幸参加了运动的全过程，对运动中的重大事件，至今记忆犹新。现回忆记述于后，希识者斧正。

一、进行土地改革的背景

解放前，许昌县的广大农村同全国各地一样，土地集中在少数地霸手里。他们凭此欺榨农民，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，使广大贫雇农过着极为困苦的生活。那时许昌县流行这样一首民谣：“徐家势力牛家钱，吴泽沛家霸西南。”

徐家是指的徐立吾。他是许昌著名的官绅，后来成了劣绅。1888年生于长村张乡，王六庄村。早年考取秀才，又毕业于河南高等警察学校，加入了同盟会，曾随张钟端参加开封起义，失败逃回。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南阳代理镇守使，随赵倜到荆紫关、郾阳等地会剿白朗义军。1918年任河南省参议员，旋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。1924年任赵倜部混成旅旅长。第一次直奉战争后，任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军事顾问。不

久又任冀南镇守使和孙岳部上校参议，河南省经制豫军总司令。孙岳倒台后，徐回原籍许昌，号称“徐大人”。当时的县官到任，都得先到徐大人公馆前去拜谒，然后方可开印视事。徐在许昌原有土地 1000 多亩，分散在圪垱、丁集、干戈李、大路陈、裴山庙、梨园、屯里、辛集、徐庄等村，均由佃户耕种，按时交租。徐在北京任议员时，于京郊购地 500 多亩。1942 年，徐在灞陵中学任董事长时，又在城东茶庵李一带廉价购地两千多亩。徐在城内有 12 处市房，计 200 多间。讨了四房太太，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。1944 年日寇侵许，徐竟寡廉鲜耻，卖国投敌，充当日军的宣抚使，坐上东洋鬼子的小汽车，沿平汉线南下，到临颍、漯河、郾城、遂平、信阳等地为侵略者张目，并沿途拢络朋党充当汉奸，共同为侵略者卖命。徐还自任许昌烟叶公会会长，垄断烟叶市场，并以烟叶换来食盐及红白糖等生活必需品，高价出售。用一斗麦买一斤盐的恶劣手法，来残酷地盘剥人民，当时的许昌劳苦大众，深受其害。而日寇军政府却以徐当汉奸有“功”，任其为伪河南特区行政长之职，成为许昌头号汉奸。

牛家指的是牛敬亭。他是石固南寨人，因 1953 年石固南寨划归长葛县，故不记述。

吴泽沛是榆林乡小岭口村人。1947 年许昌解放时，全家 30 口人，1000 多亩地，50 多间房子，30 多头牲口，还经营油坊、粉坊、豆腐坊、木作坊、粮食坊，全靠雇工耕作。吴家常年雇工近 30 人，大部分是固定年资，一年一搞盘，合适了继续干叫坐茬，不合适了到腊八前后结帐。也有一部分长工是无偿使用，诸如一些怕抓壮丁的亲朋故友，将子侄隐藏其家，能不被抓去当兵为万幸，白给干活也就心甘情愿；这

样的长工每年都有好几个，甚至十几个；这几个走了，那几个就接踵而来。吴家成了躲壮丁的防空洞。除了长工就是短工，也叫月工，多在农活集中的大忙季节雇用。还有一种短工叫锄地把，一锄一季，从种到收，有二八分成的，有三七分成的，即短工得小头，吴家得大头。长短工之外就是佃户，也叫种地户，吴家小辈们的 400 多亩“体己”地，全由几十家佃户来耕种，定期向吴家小辈们交地租。吴家除了用土地向长工、短工和佃户进行剥削之外，就是放高利贷剥削，青麦稞子是高利盘剥最严酷的一种。一到青黄不接的季节，吴家就把收来的地租，作为青麦稞子投放出去。到了麦收以后，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就得吃一斗还二斗。吴家赶上骡马大车，带上斗秤，到各村收回放出的青麦稞子。如果谁家归还不起，就要利上加利，即所谓“驴打滚”利，再不然就是以地顶债。1942 年年馑，吴家增添好几百亩土地，绝大部分都是以青麦稞子换来的。贫苦农民为了活命，明知青麦稞子是个苦果，也不得不被迫吞下。结果是仅有的土地被吴家吞并了，反过来又成了吴家的佃户。如此年复一年，压得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来。年馑那年，吴家依靠土地收来的租粮，作为青麦稞子投放完了，就把给雇工伙上的粮食裁掉（吴家家族的生活远远高于劳动者，因此给雇佣来的长工短工，另外设有雇工伙房），拿去放债，还不够用，就拿做酒用的酒曲和做肥料用的麻饼，也作为青麦稞子往外投放。麦前给穷人三块酒曲充饥，麦后得还一斗麦，麦前给一个麻饼充饥，得先指给二亩地，如此勒索紧逼，把贫苦农民逼到死亡线上。吴家还有个外绰号叫“一包净儿”，乍一看来，对这个绰号不甚了之，也就以为没有什么，实际上“一包净儿”也是一种残酷。

的盘剥手段。本村或附近村谁家死了人，特别是没儿没女的人家死了人，安排后事为困难，吴家就主动上门，提供方便。如棺木、寿衣、粮油、粉条、豆腐、酒肉等等，一应俱全。待死人入土以后，吴家就登门结算“方便”帐，算得用户不是给房子就是给土地。比如，小岭口村农民吴焕耀，跟吴家是邻居，老两口没儿没女，吴焕耀病故，吴家用“一包净儿”的办法将其埋葬，当其老伴还活着的时候，吴家就迫不及待地把其房子宅基一齐划到自家圈儿内据为己有，并垛起高高的围墙。吴家不仅在经济上如此压榨，而且在政治上，与当时城乡政权中的保长、联保主任、区长、乡镇长、参议员以及警备司令部的头目等勾结。吴家有长短枪 50 多支，豢养着成群的家丁，为其看家护院。县的西南隅，差不多全是吴家的势力范围，就是附近的土匪之类，如不向吴家进贡，也很难在那一带混下去。

徐立吾、吴泽沛，是两家知名全县的大地主。次于徐吴两家的尚有各霸一方的东霸天、西霸天、南霸天和大大小小的地富，都以同样的方式对农民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。一般年景农民尚能勉以为生。一遇到年馑和天灾人祸，就要卖房、卖地、卖儿女，逃荒要饭。

许昌虽然解放了，封建土地所有制仍像一座大山压在农民头上。如不解决土地问题，广大农民将仍置于地主恶霸的蹂躏之下。为了巩固政权，使农民真正翻身得解放，县委决定在全县实行土地改革。

二、进行土地改革的经过

1、发动群众，成立农民协会。1949 年秋，中共许昌县委，

派出了一支由 575 人组成的土地改革工作队，深入到各区、乡、村发动群众，严格执行依靠贫雇农、团结中农、中立富农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阶级路线。工作队的第一步是访贫问苦、扎根串连。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的基本方法是实行“三同”，即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对贫苦农民，不进其家门，就不是一家人；不与贫苦农民一同劳动，就无法联系感情；不与贫苦农民一同吃饭，思想就难以见面；不与贫苦农民同室居住，其苦楚就无处诉。通过“三同”，向贫苦农民讲解穷人为什么穷，富人为什么富，和谁养活谁的道理，还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进行对比，以提高其阶级觉悟。有一首贫富生活对比的歌谣，当时曾在农村广为流行。歌词是：月亮一出照高楼，穷苦人家不得自由，思想起真正难受；地主门前拴骡马，穷人门前少车没牛，耕田地人当牲口；地主吃的鱼和肉，穷人吃的黑窝头，稀糊涂还要断流；地主住的楼上楼，穷人住的破庵头，进门来还得低头；地主穿的绫罗缎，穷人穿的破袄头，补补丁还要露肉；地主要妾摆成溜，穷苦人家娶妻愁，只落得断子绝后。这是控诉的歌，发动群众的歌。歌词虽不那么高雅，是属“下里巴人”，但其语言形象而准确，一听就懂，非常适合无文化、少文化农民的口味。灵井区有一个叫齐素的女工作队员，穿着朴素，作风泼辣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的群众会上唱唱讲讲、讲讲唱唱，深受群众的拥护与爱戴。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，把贫苦农民一个一个地发动起来，吸收到农民协会中去，慢慢地树起贫苦农民在农村中的绝对优势。使压迫人剥削人的剥削者，陷入到觉醒了的农民的包围之中。到 1949 年底，全县成立起了上千个农民协会或分会组织，并先后挂起许昌县某区某乡某村农民协会的牌子，农会

会员发展到 13. 6 万多人。还在年轻会员中组建起一支上万人的农民自卫队伍，并配给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，来维护地方秩序，以壮农民协会的声威，农民不仅掌握了印把子，还掌握有枪杆子。当时在农村发生的民事纠纷和婚姻问题，都由农会负责来解决，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大好局面。

2、向剥削者进行说理斗争。通过“三同”，贫苦农民的苦情，已星星点点地向工作队说了出来，但是要让其挺起腰杆、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向压迫者剥削者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此在重点村，有先搞模拟说理斗争的。即用草人、土坯或砖头做为说理斗争的对象，让受害者对着草人、土坯或砖头进行说理。一句句地教，一句句地学，一次不成两次，三次、若干次，一直到敢于向压迫剥削者进行面对面说理斗争为止。这种模拟说理斗争，实际上是思想发动的进一步深化，使受迫害人懂得，只有把受压迫受剥削的事实说清楚，斗争对象才能口服心服低头认罪，同时还向压迫者讲明政策：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，才是唯一出路。重点突破以后，召开说理斗争群众大会，为了扩大影响，周围村庄都派一定数量的群众代表参加大会。说理斗争会上，受害农民一桩桩一件件把所遭受的苦难面对面地控诉出来。说到痛处，痛哭流涕、泣不成声，会场上谴责声、助威声、口号声，响成一片。受害人还当面质问：“这是不是事实？你说呀”，被控诉人则当面承认“都是事实，我有罪，对不起你！”如此说理斗争，在全县进行了 2300 多人次，彻底打掉了地主阶级的威风，大长了人民的志气，给顺利进行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。

3、划分农村阶级。1949 年冬，县委专门举办了划分农村

阶级培训班，笔者也参加了。培训班上，贯彻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、“怎样划分农村阶级”等文件，并逐条学习、认真讨论，弄懂弄通划分阶级的政策规定。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，以全部或大部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为雇农；有部分土地和生产工具，每年以部分时间出卖劳动力，或经营一些小本生意，以补生活不足的为贫农；有一定数量的土地，均属自家耕种，不剥削他人，也不被他人剥削的为中农；土地较多，生活也较富裕，虽有剥削但剥削量不超过全家全年收入总和 25% 的为富裕中农；拥有较多土地，自己劳动，也雇工劳动或放有高利贷，其剥削量虽达到全家全年收入总和 25%，但没有超过 75% 的为富农；占有大量土地，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或只是辅助劳动，常年雇有长工、短工，剥削量超过全家全年收入总和 75% 以上的为地主。计算剥削量的时间界限，是以 1947 年底许昌解放时为准，也可以从 1946 年底为准，向前推算，凡连续剥削三年、剥削量达到上述比例标准的，即可划为地主或富农。虽有一定数量土地，但无劳力耕种，不得不出租他人耕种，其生活全靠地租收入维持，但生活水平仅属一般的，应视为土地出租户，不能划为地主或富农。对划分阶级的政策标准经过反复讨论之后，又把自己摆进去进行试划。在小组会上，如实把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，如土地、人口、农具、劳力、有无雇工及雇工年限，有无放债及放债数量、年限等统统讲个清楚，并自我认定应属哪个阶级。最后小组评定，有争议的提交大会讨论。笔者当时在教育界任小学校长，一直被抽出来服务中心，就在杨堂本村协助工作组搞土地改革的具体工作。当时全村一百零几户人家，按阶级划分的政策规定，有 5 户划为地主，最大的一户是一家姓宋的退役旧

军官，原籍山东人，在韩复榘部当军需官，年馑那年在这里购买 200 多亩土地，全家八口人，自己不劳动，从 1942 年到 1947 年许昌解放，其土地全靠雇来的长工短工耕作，很明显这一家应划为地主。当把宋家定为地主成份之后，将宋某本人叫到农会，当面问他多少土地，从哪年开始雇工，雇过几个长工和短工，划为地主成份对不对，当其一一作答并认定自己是地主之后，还要在划分阶级的表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还向其宣布：按规定地主的土地、房屋、牲口和农具是全部没收，到平均分配的时候，再分给他和贫农相等的一份。划为富农的有 6 户，认定富农成份的办法，与地主相同，只是在计算剥削量上有差异。同时富农的土地是部分征收，不是全部没收，即征收其多余的部分，留下其应得的部分。全村有 6 户划为富裕中农，划定富裕中农的过程，是体现党的团结中农政策的过程，特别是剥削量超过 20%，接近 25% 的户，更是严格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。有一家农户叫胡文章，解放那年才十二三岁，父亲死的早，全家五口人，除胡文章是个男孩儿外，其余全是妇女老婆，20 多亩地，常年出租，其家庭生活，虽全靠出租土地收入，而其生活水平仅属一般。按照政策只能划为无劳动能力的土地出租者，土地量虽大了一些，也不能按地主对待。其他五户也都雇过长工或短工，都存在有剥削，但其雇工时间均是间断、不是连续，其剥削量都达不到 25%，所以都划为富裕中农。划为中农的 17 户，划为贫农的 58 户，划为雇农的 11 户。据统计当时全县 95722 户，划为地主的 5572 户，占总户数 5. 82%；划为富农的 6390 户，占总户数 6. 68%；划为中农、富裕中农的 10796 户，占总户数 11. 28%；划为雇农的 4608 户，占总户数 4. 81%；

划为贫农的 68356 户，占总户数 71. 41%。

4、没收征收土地。这是在划分阶级的基础上进行的，计全县共没收地主土地 164101 亩，征收富农土地 87419 亩，没收其它土地（庙地、清真寺土地、祠堂土地等）1329. 5 亩，合计 264815 亩。没收征收牲口 11575 匹（头），房屋 31659 间，碾、磨 5165 盘，犁 8567 张，耙 6274 盘，车 6888 辆，树 48117 棵，粮食 1294 万公斤，衣服 64059 件。在没收征收过程中不许侵犯中农，特别是不许侵犯富裕中农，这是一项必须严格执行的政策。还有一条就是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地主富农在城镇经营的工商业，一律不许侵犯，还不许挖地主富农的底财，以鼓励其投资于工商业。要弄清楚的是：土地改革要消灭的是剥削阶级，而不是划为地、富成份的人，包括地、富分子在内，不仅不消灭，而且还要给出路，这就是老实守法，尽快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三至五年以后，经过查评，表现好的，报政府批准，就可改变成份。这个政策，1956 年农业合作化后，开始付诸实施，由县公安局具体执行。对“四类”分子（地主分子、富农分子、反革命分子、坏分子）进行查评，查评结果，有 2257 人（占“四类”分子总数 25%），老实守法表现好，经批准摘掉帽子，成为农业社社员；有 6320 人（占“四类”分子总数 10%）表现一般，经批准成为农业社候补社员；有 501 人（占“四类”分子总数 5%）表现不好，且有不法行为，经批准继续由群众监督劳动。自那以后，每年查评一次。60 年代，70 年代，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并把阶级斗争引伸到思想领域，“四类”分子查评工作，无法正常进行，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地主、富农全部摘掉帽子，成为普通农民。

5、分配胜利果实。所谓胜利果实，就是没收征收地富的地和财物。分果实的原则是“中间不动两头平”，即中农、富裕中农的土地物资不动；地主为一头，雇农贫农为一头，将其土地物资加在一起，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。各农会选出办事公道的会员组成了评议委员会，清点没收征来的粮食、衣物和农具，逐块丈量没、征收的土地，澄清底子，张榜公布，同时将雇、贫农的土地、人口、农具、房屋以及应分的土地、粮食、农具和房屋等也张榜公布，让大家相互审查监督。发现问题，提交评委复议处理，如此反复三次，三榜定案。都没有异议之后，将没、征收的实物摆放广场，标出价格，由评委按照填坑补缺的精神呼喊姓名，把其应分的车辆、犁耙、耧、磨、粮食、衣物等果实，当场领走。土地、树木、房屋，则由评委带领应分户前去认地块，认树木，认房屋，当面交待这地这树这房子就是你的了。每个应分户分到土地、树木、房屋、财物后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从心眼里呼喊共产党万岁、毛主席万岁！贫、雇农家的妇女和男人分得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实物，以体现男女平等。

6、土改复查，1950年夏秋之际，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复查。这次复查，不单单局限于算经济帐，而且还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。1950年6月，美帝国主义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，少数不法地主富农，以为即将变天，因而蠢蠢欲动，他们把分给农民的实物又要了回去，有的把分出去的东西记到帐上等待变天。一些觉悟低的农民，怕受到报复，把分到的东西，又暗地送了回去。一时间人心慌乱。基于此，当时省、地委发出指示，由点到面地开展以“反匪、反霸、反倒算”为中心的土地改革复查运动，同时把镇压反革命与土改

复查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。为了保卫土改成果，各农民协会迅即行动了起来，组织民兵到各处追捕在逃的恶霸地主。行霸西南的吴泽沛、吴广德叔侄，以及劣绅徐立吾，都是在这个时候被捉拿归案的。吴家叔侄在全县举行的十二万人大会上被执行枪决。徐立吾亦在之后不久公审正法。其他凡有倒算行为的不管是回去的还是送回去的，一律视为反攻倒算，一概进行说理斗争，并把所有要回去的东西，全部退还给农民。计全县斗争不法地富分子 2261 人次。除纠正几户错划地富成份以外，还没收征收漏划地富土地 2110 亩和其它什物上万件，进行了第二次果实分配。运动后期，还专门组织一批力量，把全县土地进行勘丈，逐户逐块填表造册，加盖许昌县人民政府大印，分乡或分片召开群众大会，在鞭炮声和国乐声中，一户户颁发土地所有证，以巩固农民分得的土地所有权。

三、土地改革运动的效应

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，赢得了全体民众的心。听毛主席的话，跟共产党走成了广大农民的共同心愿，为新中国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1、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。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，危及新中国的安全。党中央发出了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的号召。县委根据省、地委指示，及时部署，把动员参军摆在了中心位置。各区乡相继召开动员大会，设灵堂、置灵位，举行公祭大会，向遭受美帝国主义、日本帝国主义、蒋介石反动派蹂躏致死的亡灵致祭，控诉美、日、蒋犯下的滔天罪行。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觉悟。热血男儿纷纷报名参军参战。全县

自愿报名参军者达 4100 多人。各地出现未婚妻送未婚夫，妻子送丈夫、爷奶送孙子、爹妈送儿子、哥送弟、弟送兄的动人场面。被批准入伍的青年，披红戴花。干部、亲属抑制不住激动喜悦的热泪，拉马扶镫送亲人骑上高头大马，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以及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，直送县城接兵站。与此同时，全县农民还捐献了 29 亿元人民币（旧人民币），支援前线。

2、社会安定。经过土改复查和镇压反革命、反匪反霸运动，各种敢于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邪恶势力，除极少数在逃未获外，绝大多数都相继落入人民法网，根据《惩治反革命条例》该处以极刑的处以极刑，该判徒刑的判处徒刑，该管制的交群众管制。社会治安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。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这种太平盛世，至今还被广大农民群众称道和怀念。

3、树立了干部风范。土改工作队的“三同”作风，使人民群众深深体验到，共产党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，是甘为孺子牛的公仆。通过干部的风范，人民坚信共产党的天下能长治久安，因而把跟共产党走认为是最大的荣耀，许多人都受土改工作队的感染才走上革命之路的。